



西南交通大学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第二届公共管理峨眉论坛
面向 2035 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文摘要集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2020 年 12 月

目 录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政策启示.....	1
新冠疫情中个体风险感知和行为规律：基于 6400 条新浪微博评论的分析.....	2
中国政府算法治理的新变革：生成语境、理论形态与优化路径.....	3
舆情工具：融媒体时代政策科学性转化为政策效果的必然选择*.....	4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路径依赖抑或反科层化取向？.....	5
技术驱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6
老年人参与何以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	7
数字治理基础平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8
制度如何促进城市社区有序的集体行动？——以成都市金牛区社区提案制度为例.....	9
城市群绿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共治网络：特征、演化与对比.....	10
中国地方官员何以晋升？——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11
技术适配与调适性治理-“网格赋能”的实践逻辑.....	12
“生活小事”：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兼论政权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	13
系统论视域下的行政审批局改革：结构、动力与走向.....	14
从冲突到合作：跨界水资源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15
绩效差距如何影响政府绩效？——问责压力的调节作用.....	16
治权调适、尺度重构与权威嵌入：开发区管理体制变迁的三重逻辑.....	17
地方治理与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化——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	18
三重嵌入：国家基础权力再生产机制及其影响——基于党建扶贫的多案例研究.....	19
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城市群人才政策比较研究.....	20
创新能力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研究.....	21
“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22

第二届公共管理峨眉论坛：面向 2035 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23
互联网信息监管约谈何以有效.....	24
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及空间演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25
政务公开对基层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	26
虚体性治理单元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运用.....	27
把互动带回审批：公共能量场视角下的“银川模式”初探.....	28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及经验启示.....	29
整体智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30
重点高校专项支出对双一流大学建设促进了多少？.....	31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评估：模型建构、指标设计及其实证研究.....	32
理解街头行政-一个“支配与反支配”的权力视角.....	33
基层干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之运动式执行中的问责制.....	34
府际合作、官员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差距-基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35
互联网使用能否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吗？.....	36
市场消解社会：交通扶贫破解空间贫困陷阱的内在机制分析.....	37
数字化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38
科层与运动双重治理逻辑下的组织行为异化-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多案例研究.....	39
坚持和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显著优势研究.....	41
运动式治理视角下政治动员机制何以影响扶贫绩效？.....	42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TRUST, NETWORK, AND VOLUNTEERING IN ASIAN SOCIETIES.....	43
成渝“双城记”的竞争性协同演进：行动者网络视角.....	45
政策扩散异化何以发生？——以 A 区共有产权住房政策过程为例.....	46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政策启示

——基于近十年京津冀生态治理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司林波 王伟伟 裴索亚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 要：公共政策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京津冀地区具有典型的跨行政区特征，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生态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探索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内在关系。在对行动逻辑基本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选择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近十年京津冀生态治理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构建出以动因、结构、过程、结果为主要维度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模型，研究发现：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表现出动因逻辑的整体性和自主性的双重博弈、结构逻辑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共生、过程逻辑的一般性与情境性的二重互动，以及结果逻辑的一致性与偏差性并存的逻辑两重性特征。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对所构建的行动逻辑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应用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该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诊断力。最后结合京津冀地区的应用检验结果，从提升政策协同的整体性驱动力，推动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完善治理目标的分解落实和考核机制建设，强化问责压力和绩效改进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行动逻辑；京津冀；扎根理论；

新冠疫情中个体风险感知和行为规律

——基于 6400 条新浪微博评论的分析

贺辛 王永杰 王振辉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成都 610036)

摘 要：新冠疫情中部分公众出现的冒险行为直接影响到疫情防控的效果，甚至与客观风险耦合产生新的风险。本文以新冠疫情高发期的 2 月份为分析周期，爬取并清洗出新浪微博评论 6400 条，采用扎根理论分析 4800 条评论，构建个体在危机情境中的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形成机制，并运用剩余的 1600 条微博评论完成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在疫情全面爆发时期应对行为包括积极和消极两种，而这两种应对行为的形成机制表现为由三个核心范畴组成的两个作用路径：事件情景-心理感知作用路径，公众通过对获取的情境信息处理，形成对疫情事件的心理感知。心理感知-应对行为作用路径：公众受心理感知的影响，通过行为决策过程，作出应对行为选择。研究结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效的风险沟通和情绪引导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依据，一定程度为增加疫情防控的有效性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新冠疫情；风险感知；行为应对；扎根理论

中国政府算法治理的新变革

——生成语境、理论形态与优化路径

谢小芹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00）

摘 要：近年来，政府与公众（市场）的关系逐渐由面对面转变为“指尖上”，基于大数据、程序和代码基础上的算法治理成为了当前最炙手可热的议题，“算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命题应时而生。研究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信息化革命双重叠加助推政府由传统电子政务办公和数据治理向算法治理转型；以情感和认知为核心的人，以大数据、代码和算力的技及其人技协同共创成为算法模型的关键变量，成都市高新区基于“守信通”平台基础上的个人和企业画像的典型案例验证了算法治理这一模型；进而探索出一条“治理转型-分类分层算法治理体系-治理算法化-算法法治化”的算法治理优化路径。政府算法治理开创了政府治理精细化、数字化和智慧化的新模式，同时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现代化命题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大数据；人技；算法治理；理论形态；优化路径

舆情工具：融媒体时代政策科学性转化为政策效果的必然选择

——以杭州建设“狗狗友好型城市”为例

温志强¹ 李永俊²

(1.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 天津 300387;

2.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融媒体时代下网络舆情对政府政策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多源流政策模型为分析工具，对杭州建设“狗狗友好城市”事件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个角度分析网络舆情对政府政策议程的影响，分析舆情工具对政策科学性转化的内在逻辑。提出树立舆情工具推进政策转化的意识、强化网络舆情引导、构建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等舆情工具理性的重要启示，重视舆情工具是融媒体时代政策科学性转化为政策效果的必然选择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舆情工具；融媒体；政策；科学化；政策效果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路径依赖抑或反科层化取向？

——基于桂南 Q 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张国磊

（广东金融学院 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广州 510521）

摘 要：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推动”向“主导参与”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治理”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的反科层化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联镇包村；科层制；路径依赖；反科层化

技术驱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罗 双¹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5）

摘 要：“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明确了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但技术驱动与治理现代化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信息技术应用是否能够驱动我国治理现代化？如果可能，信息技术如何驱动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其运行逻辑和演进结构是什么？为回应上述研究问题，文章认为技术驱动应该包含赋能和赋权两层含义，以“技术-治理”间的逻辑关系为主线，通过比较分析以计算为目标的智能思维，以稳定与发展为目标的管理逻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为目标的善治逻辑三者之间的共鸣与冲突；在进一步分析智能思维、管理逻辑、善治逻辑的多种结合与发展可能性的前提下，深入探讨治理现代化中技术赋权的可行路径，并提出了“技术驱动治理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和一组可供未来研究论证的命题。

关键词：技术驱动；智能思维；善治逻辑；管理逻辑；技术赋权

老年人参与何以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

王辉¹ 宋敏²

(1.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00;

2.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00)

摘要：人口老龄化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社会治理领域研究热点。故此，文章在综合交叉基础上提出老年人参与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这一研究问题。首先，从效果、效用和效率三个层面来分解治理有效性，并以内生发展视角来对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进行理论建构。其次，通过实地调研和政策文本梳理指出：老年人通过担任村干部以优化治理队伍，动员关系网络以链接治理资源，参与村庄建设以减少治理成本，生产老年福利以搭成治理伙伴等实践机制来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老年人参与；治理有效性；乡村治理；内生发展

数字治理基础平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吴结兵 叶李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基层治理创新的案例分析发现，通过信息技术构建的“基层治理四平台”作为基础数据平台，重塑了地方政府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格局，推动了乡镇（街道）从“行政末梢”到“治理枢纽”的转变，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和协同性。

关键词：数字治理；平台；基层社会治理

制度如何促进城市社区有序的集体行动？

——以成都市金牛区社区提案制度为例

赵 吉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00）

摘 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背景下，城市社区有序的集体行动必不可少。既有理论呈现制度是一种促进有序集体行动的重要变量，但对其发生机制却缺少深描。本文在中国基层治理的科层化与复杂性语境下，对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进行了改造，以分析制度促进集体行动的机理。通过对成都市金牛区社区提案制度的个案进行过程追踪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提案制度改变了集体行动的外在环境，通过公共导向的议题筛选降低复杂因素，以程序化增强理性议事，并使社区变事务处理主导者为制度维护者。而从行动情境来看，社区提案制度实现了参与者的角色转向。最大限度的增强了议事组织的身份代表性，促进基于知识导向的共识达成，过程中强调定目分层的控制，实现了制度化参与导致的成本与收益变革。本文对制度促进社区有序集体行动的案例研究，拓展了中国基层场景下制度对于集体行动发生和发展的功能性解释，对于以制度手段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集体行动；社区提案；基层治理；制度分析与发展

城市群绿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共治网络： 特征、演化与对比

锁利铭 李梦雅 阚艳秋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00）

摘要：由于环境问题所具有的跨域传播特性与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被视为打破环境污染困局的重要利器，但如何识别多元共治网络的内部结构特征与演变路径方向成为重要议题。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中杭州与合肥都市圈为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对该区域多元主体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合作网络的基本演化形式、结构属性和内部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在两大都市圈中仍然存在着多元主体之间作用发挥不均衡的现象，杭州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转变，但杭州的优化更为明显，多元协同型是未来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共治的最终路径走向和趋势。

关键词：绿色一体化发展；多元协同；网络治理；演进路径

中国地方官员何以晋升？

——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杜春林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摘要：哪些因素影响地方官员晋升一直是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本研究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以及“政治人”假设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当前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因素，认为当前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包含地方 GDP、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长等因素的经济绩效说；二是包括官员的忠诚度、教育程度、任职年限、年龄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在内的个体特征说；三是包括政策有效执行、树立典型、政策移植与创新等因素在内的政策响应说。研究认为，无论是经济绩效说、个体特征说以及政策响应说在解释地方官员晋升时都具有一定的缺陷，应当从多维理论视角探寻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地方官员晋升；经济绩效说；个体特征说；政策响应说；项目驱动说

技术适配与调适性治理

——“网格赋能”的实践逻辑

刘 锐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5）

摘 要：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为何推动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在治理场域如何发挥功能。通过对川西 A 区网格化管理实践逻辑的考察，我们发现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及县域治理分不开。一方面，基层事务治理的结构困境，要求县级组织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传统的条块合作机制面临多重问题，借势上级政策有利于风险治理。网格化管理有两大功能，一是网格技术促进及时回应，提升了扁平化治理水平；一是网格组织作为“混合型科层组织”，推动了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但是，事务由模糊转为清晰的过程，受技术治理的影响存在疏漏，“剩余事务”的协同治理效果不佳，难以协调行政与自治关系。构建权责一致的有效治理机制，应成为网格化管理研究重点。

关键词：网格化管理；事务属性；县域治理；技术适配

“生活小事”：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

——兼论政权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

包涵川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00）

摘要：有别于西方，中国治理情境中的政权和社会关系体现出水乳交融状态。形成这一状态的重要路径在于基层党政干部时常回应和解决大量与民众具体利益相关的微观生活性事宜。基于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基层政权普遍应用三种机制处理“生活小事”。一是“利益惠及”，即直接满足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益要求；二是“情感融通”，即基层干部通过共享情感的方式深入民众生活；三是“持续走访”，即逐个解决每个民众的生活诉求，并将共性内容抽象出来形成公共意志。三种机制分别使政权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得以建立、深化和扩展。处理“生活小事”使中国和西方政治过程在利益表达、意志凝聚和政权回应方面表现出了显著差别，使得治理呈现出动态性、有机化和无限责任特征。“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积淀形成的本土性治理思想与实践。

关键词：生活小事；基层治理；有机性；群众路线；中国特色

系统论视域下的行政审批局改革：结构、动力与走向

寇晓东¹ 郝思凯¹ 张兰婷¹ 屈晓东²

(1.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 西安 710129;

2.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西安 710068)

摘要：在我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中，地方上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后形成了行政服务中心与行政审批局两种实践模式，本文聚焦研究后者，以期对行政审批局改革的系统特质形成认知，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种行政审批局改革的系统论诠释，并前瞻改革实践的未来发展。文章首先指出当前审批局改革面临审管联动不足这一主要问题，强调立足系统论认知改革进而探讨由数据驱动的高水平审管联动路径的重要性。其次综合文献回顾、实践审视与前期调研，对审批局改革进行系统界定，认为它是一个复合化的时空活动过程系统，同时给出该系统的时间-空间-动力三维框架构建。进而，从审管分离与联动、审管协同两个主要阶段，对审批局改革所涉的审批权力重置、审批知识合作与审管信息交互、审管数据驱动等主要驱动力角度，对改革内容进行详细探讨，以完整刻画改革的脉络与逻辑。最后，从“点线面体”四个层次评析审批局改革的未来走向，并尝试评估这一改革的历史与实践地位。

关键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局；系统分析；数据驱动

从冲突到合作：跨界水资源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张露露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31）

摘要：丹江流域鄂豫边界荆紫关段的水事纠纷是观察我国跨界水资源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典型的本土案例。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法，通过边界水事纠纷阶段（1954-1976 年）和防洪工程建设阶段（1976-2006 年）的过程追踪和比较来探索丹江流域跨界治理模式变迁的因果机制。跨界水事冲突产生的原因在于全能政府的控制和领导、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利益竞夺、民主参与不足和水规水法匮乏。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的介入、流域机构的调处、民主参与组织的建立、法治保障和技术支撑使丹江流域的跨界治理从冲突走向合作。基于此归纳总结一个“利益-组织-制度”的三维框架用以分析跨界治理的结构及其变迁。丹江流域跨界治理对新时代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比较历史分析；丹江流域；跨界（域）治理；水事冲突；合作治理；生态环境治理

绩效差距如何影响政府绩效？——问责压力的调节作用

王程伟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从绩效差距角度探究绩效提升是绩效管理研究的一项新兴命题，而构建绩效差距对基层政府绩效的完整影响机制是亟待探索的问题。绩效反馈理论认为绩效差距影响绩效水平，而本文试图探究上级问责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的政策背景，本研究收集 2019 年 16 个区 333 个街乡镇分数和排名等数据，对市、区两级问责压力对绩效差距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上级问责压力会调节绩效差距对绩效水平的作用，且市、区两级问责压力的调节效应不同。区级问责压力仅会调节社会绩效差距对绩效水平的影响，增强正向绩效差距的正向影响，减弱负向绩效差距的负向影响。市级问责压力仅会对正向历史绩效差距的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结果深化了我们对绩效差距影响绩效水平的机制的理解，为加强政府绩效管理与提高基层治理绩效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绩效反馈；“接诉即办”；绩效差距；行政问责；社会治理

治权调适、尺度重构与权威嵌入：开发区管理体制变迁的三重逻辑

——以 S 开发区为例

高恩新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00）

摘 要：政企合一、大区域管理、“双管委会”、整体协同型开发区管理体制迭代演化是国家战略需求、外部环境变迁和内部治权冲突混合驱动的结果。开发区管理体制转型呈现出三重逻辑：从治权配置上看，开发区管理主体“赋权增能”转向事权分化，反映了区域社会形态转型和国家战略加持对组织体制的塑造机制；从尺度重构策略看，尺度下移强化了开发区域治权的完整性、自主性和责任性，尺度上推强化管理主体全域协同能力；从治权空间来看，“脱嵌”于常规政府行政体系的开发区管理体制缺乏合法性、稳定性和政治势能，需要借助于“科层化权威嵌入”平衡常规政府体制与柔性开发区体制之间的张力。开发区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体现了空间治权完整性与政治权威依赖性的共存共生，深刻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运作中的权力中心主义和任务导向特征。

关键词：开发区；治权配置；尺度重构；权威嵌入

地方治理与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化

——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

霍晓丽

（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摘 要：地方治理要依赖地方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可以借鉴传统智慧和历史经验。湘西苗族社会结构的演化是具有能知和能动的民众在一定时空中运用民族规则和资源持续不断地建构社会结构的行动过程，既契合了中央王朝治理民族地区的诉求，也满足了苗族地区地方治理的需要，是国家外部力量与地方内部权力交融、互嵌、整合的结果。湘西苗族地方治理的主体从传统权威群体转变为新兴管理阶层发展到多元治理共同体，能够为当下民族地区地方治理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地方治理；湘西苗族；社会结构；多元治理共同体

三重嵌入：国家基础权力再生产机制及其影响

——基于党建扶贫的多案例研究

吴高辉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长沙 410000）

摘要：消除绝对贫困不仅是中国 2020 年决胜全面小康的重大任务，也是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建扶贫”可能成为反贫困史上的重要中国经验。然而，实践上的如火如荼却面临着理论上的困惑：政党如何渗透并引领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参与观察与实地访谈的田野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党建扶贫的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以及话语宣传的三种不同路径构成了“利益-权威与观念”的三重嵌入机制。它反映了国家基础权力再生产的逻辑转换过程：“利益嵌入与观念嵌入的一致发生冲击了乡村治理秩序而产生了权威嵌入的需求”。我们认为：三重嵌入机制使得贫困问题从一般社会经济问题上升为重大政治问题，激发了基层治理主体的“共同体意识”，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官僚制的脱贫压力而塑造了乡村自治的官僚化进程。本研究的可能意义在于比较、对话了政党社会学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揭示了中国党建扶贫的内在动力与作用机制。

关键词：党建扶贫；三重嵌入；国家权力；政党社会学；自治官僚化

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城市群人才政策比较研究

——以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例

彭川宇 郑顺虹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成都 610031）

摘要：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构建“基本政策工具--政策吸引力--政策效果”三维分析框架，以 2014~2020 年的 154 份聚焦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人才政策为样本，运用 NVivo 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全面运用了基本政策工具，以供给型工具为主，注重对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人才成长平台的建设；成渝城市群的政策力度大，政策所涉及的人才覆盖面较广，注重采用多元化的激励手段；但二者均存在交叉运用各维度时的适配度偏低、人才区域协作力度较小的问题，城市群的人才发展还处于相对分割的状态。因此，需加强各维度下具体指标的匹配应用，推动城市群人才的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城市群人才政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政策文本分析；城市群；人才政策；比较研究

创新能力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评价研究

杨建¹ 方浩² 青爽¹

(1.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成都 610031;

2.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 要：党的十九大已经作出了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判断，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本文基于熵值评价法，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与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发展度不高，范围在 0.23 到 0.59，基本处于初级协调发展、轻度失调发展和严重失调发展三种状态；（2）不同区域的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状态存在显著差异，我国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地区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东部沿海、中部平原地区以及西部川渝地区为轻度失调状态，而我国东北部以及中西部偏远地区则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因此，针对不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本文从构建跨区域合作创新网络、提高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水平以及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提出了因地制宜地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耦合协调；区域差异；跨区域合作

“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张书维 谭小慧 梁歆佚 朱亚鹏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当前我国已迈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提高生育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在其它宏观或客观因素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助推”作为一种全新的行为公共政策干预工具，或能另辟蹊径，为提高生育意愿打开局面。本文遵循“助推”思想，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277+556)，探索信息框架(包括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对于生育意愿的助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失而倍得”政策框架，“得而不失”政策框架更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新闻框架调节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家庭导向的宣传立场相对于国家导向宣传立场，能够更显著地增强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作用；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总收入也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落袋为安”的政策框架效应与“家庭导向”的新闻框架作用对完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生育意愿；生育政策；政策框架；新闻框架；助推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舒全峰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 100000）

摘 要：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本文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劳动力外流；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互联网信息监管约谈何以有效

——基于 41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李文娟 王国华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互联网信息监管约谈是政府用以矫正互联网信息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一种重要规制工具，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互联网信息治理水平。互联网信息监管约谈何以有效，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基于合作式治理理论，从政府、企业及社会三方主体复杂行为逻辑出发，提出理解互联网信息监管约谈何以有效的整合性框架。以 2015-2019 年 41 个约谈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探析管制压力、专项行动、公司规模、热点舆情事件、公众参与及舆论压力六个具体条件变量相互依赖对互联网监管约谈效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均不是互联网约谈有效的必要条件，约谈有效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 9 种，可归纳为事件引发式、高压管控式、内外制约式及合作共治式。互联网监管约谈效力释放需政府积极管控、企业主动配合及社会广泛参与。研究为互联网信息约谈效果提供一种因果解释机制，为优化互联网监管约谈制度设计及推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提供支持性证据，为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互联网约谈；合作式治理；定性比较分析；约谈效果；合作共治

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及空间演化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陈江¹ 詹国彬² 段小力³

(1.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00;

2.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1815;

3. 郑州师范学院 经济学院, 郑州 450000)

摘 要：以 2012~2019 年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区域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 综合评价法、重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序，继而考察该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关联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安徽省已形成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和黄山为核心的高质量城市群。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有升有降，但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其质量重心一直聚集在合肥市，形成以合-芜-马和合-铜-黄方向为轴线的向西和北部衰减的圈层结构。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空间正相关性逐渐衰减，但保持空间集聚效应。有鉴于此，未来可依据安徽省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布状况，构建多中心构架的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都市圈；打破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中于合肥市的局面，构建全省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财政分配机制；形成以经济协作为动力，促进各市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协同机制；重构安徽省公共服务质量管理机制，持续改进服务质量测定、服务质量认证和服务质量流程。

关键词：熵权-TOPSIS 法；区域公共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空间演变；安徽省

政务公开对基层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

鞠逸飞 董新宇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委托-代理和政府信任理论提出政务公开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内在逻辑；随后基于 IS 成功模型，以人民调解为切入点，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基层政府政务公开的有效模式。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务公开可以缓解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外部监督的有效性，防止公务人员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高透明度的政府可以获得更高的公众信任，进而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观满意度。较高的公开信息完整性是高质量的基层公共服务的充分条件；基层政府政务公开的有效模式主要有两种，即政务公开信息丰富性低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高和政务公开信息丰富性高且公开信息的及时性高。

关键词：政务公开；基层公共服务质量；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政府信任

虚体性治理单元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运用

杨龙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00）

摘要：经济区、功能区等虚体性治理单元的治理功能单一，机构设置简单，不是一级政府；通常只有专项权力，只得到行政区授予的部分财权；虚体性治理单元不改变行政区的边界，其边界“软”。虚体性治理单元的这些特点正好补上了行政区这样的实体性治理单元在治理方面的“短板”。经济区包括全局性区域和局部性区域，功能区包括各类开发区和自贸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专题性改革试验区，各有特定的治理功能。虚体性治理单元也有不足，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需要把实体性治理单元虚体性治理单元结合。国家级新区综合了行政区和功能区的优点，城市群结合了城市与经济区的长处。

关键词：虚体性治理单元；区域；功能区；国家级新区；城市群

把互动带回审批：公共能量场视角下的“银川模式” 初探

程广鑫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审批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重塑。以政府主导的改革方式与以人民满意的目标导向理应融合，但二者在现实中时常分野，这主要是由于对政府主导的认知偏狭所致。实际上，政府主导可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是重视民众参与的政府主导，二是忽视民众参与的政府主导。银川模式试图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场域中嵌入市场及社会的力量，以互动的方式实现政府主导与以人民满意的统一。以其为考察对象，梳理政民互动的演化类型，借助公共能量场理论审视政民互动的动因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的路径与推广建议。

关键词：互动；审批制度改革；公共能量场；银川模式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及经验启示

——以绵阳市 Y 小区自治实践为例

周强伟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00）

摘要：本文从探究小区自治治理的角度入手，通过调查绵阳市 Y 小区自治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小区治理展开分析并致力于探寻经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将基层治理纳入到党的建设进程中，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形成人人都参与社会治理，人人都自觉担负责任的良好局面。小区是城市的基本细胞，也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活跃区域，不仅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也日益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加强小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对增强社区治理、小区自治能力，进一步发挥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基层治理；小区自治；党建

整体智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汤啸天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0000）

摘 要：党中央对平安中国建设、社会治理、健康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对“人民安全”应当从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四个方面理解。社会治理体系在疫情防控期间既经受了考验也暴露了短板，疫情防控常态化要与社会治理融为一体同步推进，“平安+健康”是社会治理永恒的主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一是在巩固平安建设成果的同时推进全民安康建设；二是在整体智治中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是在“六保”“六稳”中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四是建立平时共建共治共享向战时联动联防联控转换机制；五是运用现代理论成果推进德治法治的更好结合；六是“健康码”改造升级为个人动态数据集成码。

关键词：整体智治；平安中国建设；社会治理；健康治理；市域；现代化

重点高校专项支出对双一流大学建设促进了多少？

——基于 156 所重点高校的绩效检验

廖逸儿

（汕头大学 法学院，广东汕头 510000）

摘要：建设双一流大学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必要手段，财政支出是建设绩效提升的基础与支柱，高教财政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双一流高校建设绩效提升的关键。基于重点高校支持计划有效性引发的争议，利用国内 156 所高校 1994-2019 年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的方法，以 QS 排名、考生满意度排名、高水平学科数量与科研经费等指标作为表征，检验重点高校专项支出对“双一流”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211 工程”与“985 工程”确曾显著提升国内重点高校国际排名，但此后出现绩效停滞，在“双一流工程”激励下，国内高校在高水平乃至顶尖学科数量上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2）随实施时长增加，重点高校建设专项在排名提升上受到的激励作用呈边际递减乃至负作用特征，专项存在所谓“绩效周期”而无法保持持续性的高绩效产出；（3）重点高校建设专项仍对顶尖高校学科水平提升发挥重要作用而非所谓呈现“经费饱和”，国内顶尖高校与世界顶尖高校在经费规模上仍存在差距；等等。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一流”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双一流；财政支出绩效；高校建设；绩效改进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评估：模型建构、指标设计 及其实证研究

吴旭红

（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南京 210094）

摘 要：县级政府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对政府治理能力定量评价和制度的相关理论与基础研究，依据“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逻辑，构建了包含资源汲取能力、资源整合与配置能力、资源运用能力及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的整体感知能力等四个维度的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结构与评估框架模型，并遵循科学化的设计方法和程序，建立了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的县级政府治理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和能力质量分级标准，并选取了 6 个典型的县级政府进行了实证评估和分析。研究表明：（1）县级政府治理的能力是一个可以被定义并且能够进行科学度量的范畴领域；（2）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结构不同于其他层级的政府，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方面有其特殊性；（3）县级政府的行为偏好和能力强弱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塑造的；（4）找到制约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因子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及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评估与测量。研究对于有效提升县级政府治理能力，打造“有为”政府，全面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字：县级政府；治理能力；模型建构；指标设计与评估

理解街头行政——一个“支配—反支配”的权力视角

祝贺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长春 220100）

摘要：众多学者对街头官僚理论已经有了深入的探讨，然而批判地看待现有研究，研究者常常忽略了街头官僚和公众之间互动形成的街头行政关系。尝试从形成街头行政关系的两类主体出发，借助“支配—反支配”权力视角来理解街头行政，发现街头行政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类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同时选取新冠疫情前后的街头行政关系变化情况作为研究对象，佐证了这一分析视角的可行性，进而为理解后疫情时代的街头行政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街头官僚；街头行政；支配—反支配权力；新冠疫情

基层干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之运动式执行中的问责制

钱星宇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00）

摘要：自 2019 年 12 月中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以来，在过去的半年之中，疫情已经蔓延至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仍然在全球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继续扩散，而中国政府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了疫情的扩散，而基层干部在此次疫情当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对质性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此次疫情当中基层干部执行政策的动机不在于“晋升锦标赛”所强调的晋升激励，而在于被问责制的强大压力所推动。因此，我们提出研究问题：1）在此次运动式治理中，什么情况下会触发问责制？2）为何问责制格外关注这几个方面？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利用扎根理论对湖北省 557 名被问责官员的问责缘由进行分层编码，构建了运动式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发现此次疫情当中的运动式治理由五个要件组成：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宣传、领导小组、激励问责机制、监督与公众举报。同时，运动式治理的有效实施在于官僚压力和问责制两大因素的相互推动。此次疫情中的官僚压力由绩效合法性、政府回应性和公共舆论压力组成；问责制则由可量化任务与政治绩效评估所组成。通过扎根理论的分层编码和运动式治理理论框架的建立，我们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其一，在此次运动式治理中，当基层干部无法满足官僚压力当中的绩效合法性、政府回应性和公共舆论压力的上级需求时，问责程序便会触发。其二，由于绩效合法性直接决定此次运动式治理成功与否，政府回应性是中央政府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府权威的重要手段，公共舆论是影响党和政府绩效合法性的重要因素，疫情期间的问责制格外关注这三项，同时以官僚压力的形式向基层政府施压，使其有效地实施相关政策，最终达到运动式治理的最终目标。

府际合作、官员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差距

——基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李智超¹ 谭西涵²

(1.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既体现在各个城市群之间，又体现在城市群内部。缺乏有效的府际合作，不仅会增加城市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会拉大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府际联席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旨在推动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官员流动则是我国政府人事制度的重要安排，对于抑制腐败具有积极作用。文章以 2008 至 2017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使用学界公认数据集，构建相关城市的府际合作网络和官员流动网络，运用 QAP 关系型数据计量模型，探究多重因素对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府际合作和官员流动对于改善城市经济差距有一定作用，但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影响；（2）推动城市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手段，但还应重视府际合作、官员流动对缩小城市经济差距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府际合作；官员流动；城市经济差距；城市群；社会网络分析

互联网使用能否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吗？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例证

蒙媛¹ 陆远权²

（1.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00；

2.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00）

摘要：2020 年后我国将进入相对贫困阶段，缓解相对贫困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互联网+扶贫”新模式成为我国减贫的重要举措。采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 Probit 模型、Logit 模型等多种实证方法，评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无论是从客观相对贫困还是主观相对贫困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缓解作用。（2）进一步异质性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部地区、女性农户和中年农户相对贫困减贫效应更大。同时也采用 PSM 模型、ivprobit 模型 2 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缩减样本数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度量方式 3 种方法稳健性检验，所得结论仍然成立。（3）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是通过信息搜集和非农就业这两个机制来降低农户相对贫困。本文希冀为农户生活富裕、提高农户福祉、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实现以及促进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农户相对贫困；作用机制；中介效应

市场消解社会：交通扶贫破解空间贫困陷阱的内在机制分析

——以山区贫困村为例

刘 升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贵阳 550025）

摘 要：在交通条件改善之前，山区贫困村受地理地形限制，交通不便，且山区生产生活条件艰难，在难以得到外部市场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山区贫困村民为了生存内生出一套紧密而有效的“社会化帮工”组织方式，以应对单家独户无法完成的事情，但“社会化帮工”组织方式的本质是以劳动力等价互换为基础的换工，在当前打工经济背景下，山区贫困村的“社会化帮工”组织方式因为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限制了村民外出打工，导致村民陷入空间贫困陷阱；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下，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开展交通扶贫，外部市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全面进入山区贫困村，山区贫困村过去长期既是依赖又是束缚的“社会化帮工”被“市场化雇工”消解并替代，其劳动力资源得以更充分的参与外部市场，从而实现了山区贫困村的快速脱贫。

关键词：交通扶贫；空间贫困陷阱；消解；社会化帮工；市场化雇工

数字化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孙卓华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使城市基层社会发生了飞跃变化，不同社区成为基层社会的载体。由于城市社区居民的复杂多样性，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无法适应社区现实的治理，使得基层社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互联网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城市基层社会发现问题和进行治理提供了技术手段，比如，社区里宠物行为的监督、地摊经行为疏导、疫情防控检测、社区治理政策宣传等。由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在社会治理中的意识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动员理论，研究城市政府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动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使其认清城市发展与个体利益关系，从而使这些不同主体积极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并把相关的数字技术资源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动员理论；数字化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线上线下结合

科层与运动双重治理逻辑下的组织行为异化

——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多案例研究

曹晴阳 梅赐琪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00）

运动式治理，被认为是能够弥补常规官僚运行机制的不足的有效治理手段，其特征不在于用运动的方式集中资源、调动各方力量来集中解决某一特定领域的问题。然而在基层运行中，面临着执行悖论：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大大削弱了其执行效果。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现有研究对运动式治理的探讨尚且集中于宏观理论和数据分析层面，缺少深入田野的观察。

主流文献的观点认为，运动式治理和科层治理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和领域发挥作用。然而，借助组织学的视角，本研究从基层执行的角度观察到了运动和科层两种治理手段共同作用。地方职能部门是执行机构的最后一个触角，在运动式治理中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对于组织而言，一方面，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外生冲击，强化了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组织行为仍然表现出根植于科层结构的约束。在这两种力量下，组织产生了四种行为：1. 在制度变迁的初期，有组织没有意识到变化了的外界情况与过去已经显著不同，因而产生了消极抵抗行为。2. 官员将遵守规则变成了目的本身，因此发生了“目标置换”，体现为形式主义“一刀切”。3. 科层结构下不可避免的冗余的设计，使得组织之间产生了工作职能上的重叠，催生了其推诿和避责行为。4. 人格化治理的特征激活了党政领导人的卡里斯马特质，使得组织在高授权下可以“乱作为”。

本研究于 2017-2020 年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期间，对西南、中部和东北的三个省份下辖的五个县（区）进行了田野调查，结合文本资料和实地访谈的方法进行了多案例比较。本研究认为，当科层结构下的组织遇到运动式治理的冲击时，“放权”和“问责”措施为代表的人格化治理特征并不能取代科层结构下官僚化、理性化的组织行为特征。在权力和责任的两个维度下，地方职能部门产生了消极抵抗、推诿避责、形式主义、违法越权四种行为模式。本研究从运动和科层双重治理的角度对运动式治理的效果进行考察，描摹了运动式治理在基层展开的复杂

图景，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理解。



坚持和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显著优势研究

李萌

（中央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00）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前提下，在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政治方向保证下，我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克服和突破了一切阻碍中华民族前进发展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障碍，领导勤劳和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东方奇迹，让曾经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的质的飞跃。这些瞩目成就是历史的伟大实践，无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一致，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确保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取得巨大成就，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集中全体人民的力量办大事，是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力量源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

运动式治理视角下政治动员机制何以影响扶贫 绩效？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张 莹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摘 要：近年来，诸多学者通过定性方法对运动式治理对精准扶贫绩效的正负效应争执不休，这种争议缺乏实证研究的验证，其中的作用机理仍有待实证的检验。以运动式治理为视角，引入公民参与机制与考核机制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探究政治动员机制如何影响扶贫绩效。基于国家级贫困县的 910 户家庭的有效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 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机制在政治动员机制与扶贫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作用；考核机制正向调节政治动员机制对公众参与机制的影响等。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Trust, Network, and Volunteering in Asian Societies

Wu Hsin-Che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China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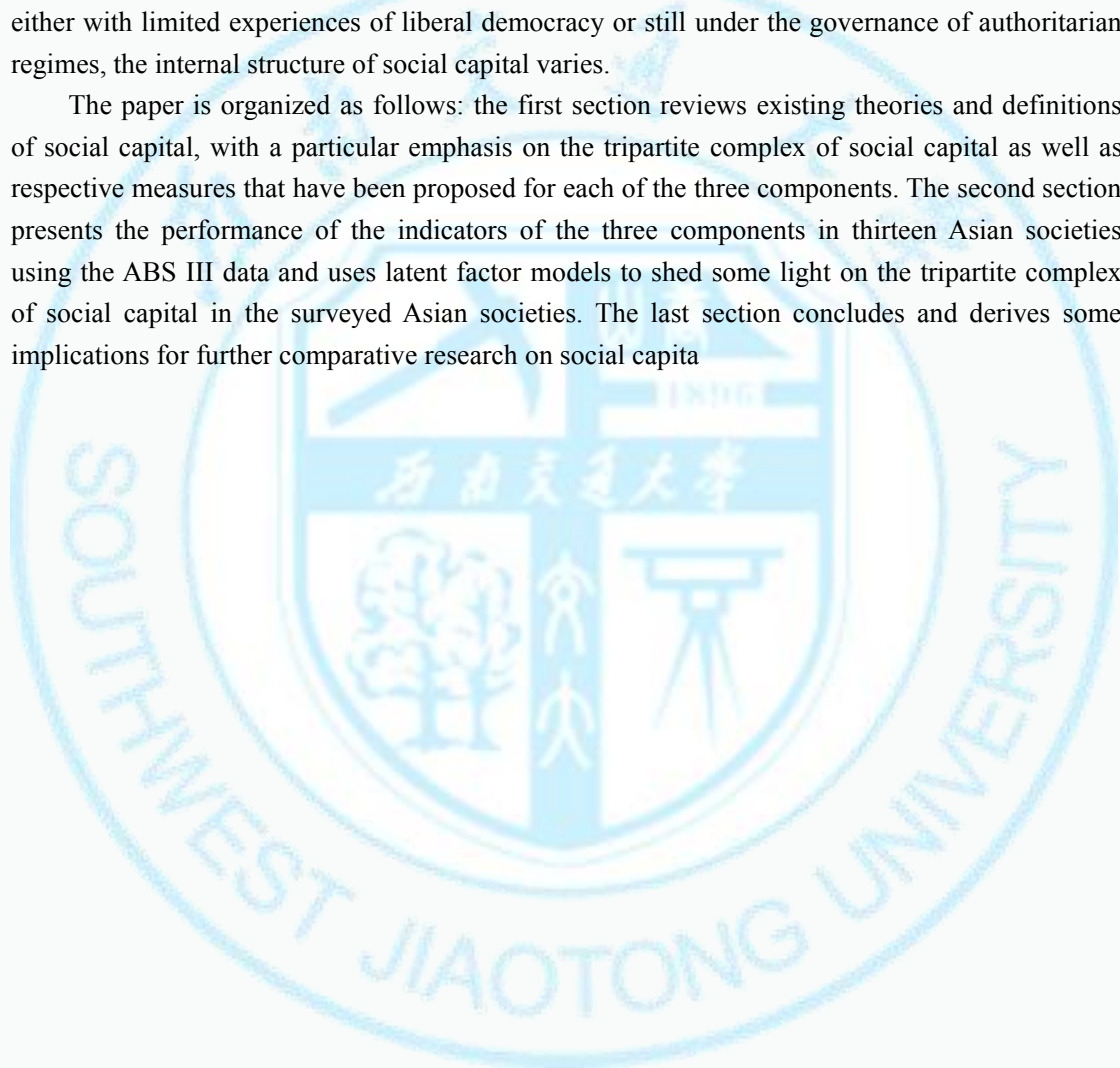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does not fully settle the definition problem of social [2]. However, despite the lack of a clear and undisputed definition,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widely embraced by social scientists as a critical variable to explain numerous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For some economists, in the same way as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lubricant for the performance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11, 16, 26, 31]. For some sociologists, social networks, as well as the norms and values cultivated via and embedded in socialization, provid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and interactions of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3, 6, 23, 24]. For some political scientists, people's experiences of cooperation, usually learned via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re indispensable fo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perform and even the key component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democracy [9, 13, 17, 29, 30]. Theoretically, social capital, as an overarching concept, has been used to cover all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trust, social network, and volunteering. Nevertheless,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its origins, evolution, and consequences, has generated varying and even contrasting results [14, 20, 22]. No consensus, other than that social capital is important and merits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established among studen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 key challenge, in addition to the lack of a clear and undisputed definition,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critical but unfortunately nebulous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structu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ust, social network, and voluntary cooperation, theorizing their respective implications for behavior and attitude, and establishing appropriate empirical measures for each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se issues of conceptualization, operation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are of particular sali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in new democracies or non-democracies. The whole industry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democracies like France, Italy, and the U.S., which provided rich and informativ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derlying tripartite complex.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Western democracies, including its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s left an imprint o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se societies [13, 30]. Thu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ynamics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in new democracies and authoritarian socie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distinct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s and trajectories, resemble those in Western democracies has huge implication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In other word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works the same way beyond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how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shaped or transformed by different societies' distinct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experience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before engaging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is paper, we revisit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in thirteen Asian societie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the third wave of 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III). More specifically, building upon exist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we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ree key components of social capital (trust, social network, and voluntary cooperation), evaluate their respective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Asian societies,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Overall,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societies. In consolidated Asian democracies like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performs similarly to what has been documented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n other Asian societies, either with limited experienc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r still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varies.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section reviews existing theories and definitions of social capital,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as well as respectiv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for each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The second section presen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dicators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in thirteen Asian societies using the ABS III data and uses latent factor model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tripartite complex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surveyed Asian societies. The last section concludes and deriv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成渝“双城记”的竞争性协同演进：行动者网络视角

马捷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0066）

摘 要：双城经济圈战略为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为破解同质化竞争、中部塌陷等长期困扰成渝合作的难题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国家政策、区域政策以及多层行动者之间交互有利于实现从地方政府的锦标赛竞争，到区域内的竞争性协同，这也是一个不断累积信任程度和协同收益的过程。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和 ICA 理论对成渝合作进行纵向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基于竞争基础上的合作策略是扩大网络，通过增加网络成员提升自己的核心位置来赢得竞争对手的主动合作；（2）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转译过程实现节点识别和收益共享，互惠共赢的网络结构能够累积信任，从而有利于推进一体化；（3）关键行动者在转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渝同城化的双城经济圈实现了内聚抱团，成渝共节点，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央协调者外部驱动向网络行动者自我增长的网络化治理转型。本文的贡献在于识别了成渝双城分阶段合作推进的网络结构演进，揭示了从排位竞争到竞争性协同的转译机制。

政策扩散异化何以发生？

——以 A 区共有产权住房政策过程为例

吴 宾 张丽霞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政策异化包括扩散异化与执行异化两部分，从政策扩散视角审视，政策扩散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然而，并非所有扩散结果都是正向的，异化也是扩散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探究政策扩散异化及其生成逻辑，本文基于政策扩散的理论视窗，以 A 区共有产权住房政策过程为例进行过程追踪。研究发现，政策扩散异化呈现“形似神异”的样态政策，具体体现为政策形式与原型一致，而政策目标转向、性质发生质变，并最终表现出不同于创新和趋同正向演进的负向政策结果。扩散异化的生成源于合法性逻辑、效率逻辑、行动者逻辑三重逻辑的综合作用，特别是合法性逻辑掩盖真实的效率逻辑和行动者逻辑，三重逻辑背后所隐含的趋利避害价值取向最终诱发和塑造了政策扩散异化现象。

关键词：政策扩散异化；政策扩散；共有产权住房



西南交通大学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第二届公共管理峨眉论坛 面向 2035 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 年 12 月